

•CHONG QING KANG ZHAN CONG SHU•

抗战时期 重庆的军事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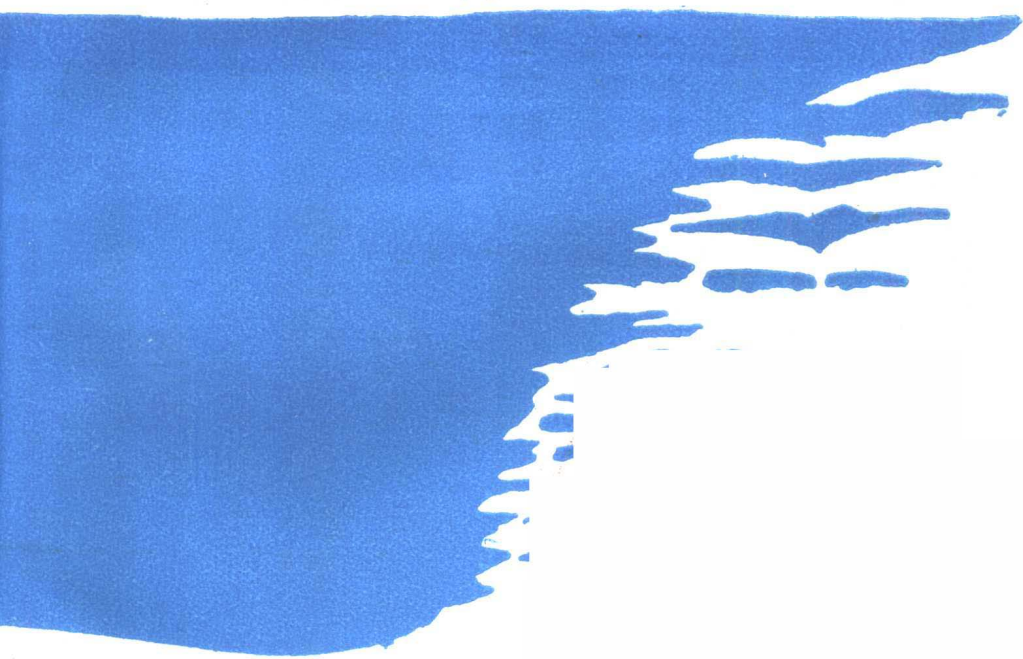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张德尚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唐润明 主编

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

(重庆抗战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九宫庙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6 字数223千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01--4,000

*

ISBN 7-5366-3126-x/E·11

定价: 13.05元

出版说明

一、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振兴重庆服务，特编纂出版《重庆抗战丛书》(下简称《丛书》)。

二、《丛书》属学术性著作。它立足陪都重庆史实，联系全国抗战形势，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层次的研究，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既可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参阅，又面向社会，供广大读者和海外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三、《丛书》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国民参政会、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军事、兵器工业、防空、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对外交往以及陪都人物、陪都遗址和大事记等16本专著。

四、《丛书》的年代断限，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止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某些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史实，可适当将时限前展或后延。

五、《丛书》的开本为大32开，数字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注释一律采用脚注。

六、《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协重庆市委和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中共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日报社、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教学、科研人员与专业干部。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襄盛举的成果。

序

《重庆抗战丛书》，是重庆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一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书。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据我所知，最近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单位也将有一批抗日战争的专著和资料出版。其中《丛书》并且不止一部。在抗日战争过去50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热潮。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由不止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须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历史常有巧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不能自拔。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共42年。那中间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们都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进行了17年，屡起屡仆。日本军国主义却在这个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并进而分裂华北。中国真正临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个严重形势下爆发的。八年抗战的过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过程。在那以后四个春秋，中国人民一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紧接着又跨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关。时代接连不断地迅速地改变面貌，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回顾甲午战争以来

10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八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伤巨痛，累累血污，也看到了它的倔强挺立高大的灵魂；不仅看到了旧中国如何死死拖住历史前进的后腿不放，也看到了历史如何促使人们觉醒，加速把旧中国变为一个新中国。

重庆在抗日战争中政治环境独特。它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则是在重庆进行与展开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蒋介石的会面和谈判。抗战期间，重庆本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有研究整理出来，供人了解的价值。谈论抗日战争，少不了要讲重庆的种种活动，就像少不了要讲延安的种种活动一样。历史给予了这两城市极大的光荣。《重庆抗战丛书》一系列研究专题和资料，涉及不少领域，具有特色。人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去认识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怎样为后来新中国的降临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把全国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了。许多地区，不分前线与后方，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史实值得笔之于书。有了它们，就有了我们全民族这场惊天动地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全貌。《重庆抗战丛书》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它是我们望到的以地区命名的第一部大型历史书，不是这方面仅有的一部书。

刘大年

1993年5月4日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

顾 问 黄 冶

主 任 张文彬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中文 刘崑水 李书敏 杨光彦 耿 聪

陶维全 徐朝鉴 蒋际华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湘 文履平 刘豫川 冯玉荣 李宗杰

杨从荣 陆大钺 陈贤义 罗传勳 周永林

周宗贤 郭培基 黄长军 彭伯通 蒲华清

《重庆抗战丛书》编辑室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编 辑 陶才祯 杨耀健 王建西

本书编写人员

作 者 唐润明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1
第一章 重庆战时军事指挥地位的确立·····	1
一、战前重庆的军事地位·····	2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渝与重庆军事指挥中心地位的确立·····	11
第二章 战时重庆的主要军事机构·····	24
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	24
二、重庆行营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	41
三、各战区、各集团军驻渝办事处·····	54
第三章 战时重庆的重大军事活动·····	70
一、国民党中央有关军事问题的决策与举措·····	70

二、军事当局有关战时军事的重要施政·····	89
三、在重庆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	125
第四章 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与活动 ·····	147
一、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	149
二、史迪威来华与“史迪威事件”·····	167
三、战时重庆的中外军事交流·····	195
第五章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	218
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发起·····	219
二、重庆各界实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概况·····	226
第六章 战时重庆的防卫 ·····	239
一、军事委员会有关防卫重庆的措施·····	240
二、对重要机关团体厂库住宅的警卫·····	269
后记 ·····	285

第一章

重庆战时军事指挥地位的确立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早在数千年前，这里就成为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进入封建社会后，它又长时期成为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特别是到了近代重庆开埠之后，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更是远远超过成都，因而也更为各方势力所青睐。1935年3月，作为当时国民政府负最高国防军事责任的蒋介石，在抵达重庆的次日，即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思想^①。嗣后，随着蒋介石对四川、对西南重要地位的进一步认识，到1935年10月蒋介石离川前夕，即完全确立了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① 蒋介石：《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1935年3月4日），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编：《参谋团大事记》第866页，1937年7月版。

因此,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即移驻四川重庆办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所辖各部、会、署等也相继迁抵重庆,制定作战方针,直接指挥正面战场的对日战争;1942年初同盟国中国战区成立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兼任战区最高统帅,重庆的军事地位更一跃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心,战时重庆的军事指挥中心地位遂完全确立并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为止。

一、战前重庆的军事地位

(一) 重庆的地理位置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它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重庆在地理上的位置,依据著名地质专家丁文江教授1930年在城内中央公园事务所的测定,大致为北纬二十九度三十三分三十四秒,东经一〇六度三十三分五十八秒;①又据重庆市经济地理编辑委员会有关材料统计:在中国大陆今天的版图上,重庆实际上处于腹心地带,它距祖国的最东端、最西端分别为3186、3150公里,距祖国的最南端、最北端分别为2934、2925公里,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自然地理上,重庆处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居于川东南延伸的平行岭谷与川中丘陵、四川南部山地的结合部,是盆地底部较低的部份。重庆城区则座落在中梁山和真武山的丘陵地带,被长江、嘉陵江分割成三个部分,中心区又位于两江的汇合处。重庆城区这种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东出可借助长江水运直达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

① 转引自彭伯通著:《古城重庆》第9页,重庆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② 重庆市经济地理编辑委员会编:《重庆经济地理》(修订稿)第一册第3页,1985年5月版。

苏、上海等省市，并通联于世界各地；向西又可以通过长江、嘉陵江及其众多的支流，沟通与四川其他各地及贵州、云南、陕南、甘南等地的联系，从而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水道运输网的总枢纽，不但是控制川西、川北、川南的要冲，也是扼守云、贵、川、藏诸省沟通沿海的门户，在地理位置上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重庆城三面环江，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联，城区、江北、南岸三区，既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在古代交通工具及攻城器械均十分缺乏与落后的情况下，西部两路口上的佛图关，海拔370米，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全城平均海拔为240米），为陆路入城的唯一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佛图关，整个城区的防守就固若金汤。所以曾任明代兵部右侍郎的刘时俊在《驻军佛图关》一诗中写道：“军驻严关扼上头，凭栏百里望皆周。群山翠点高低列，两水清涵上下流。地险我何妨进退，城孤彼自受羁囚。一时纵目还生喜，釜底游鱼可待休。”^①

重庆城重要的军事地位，还不仅限于它拥有三面环水之险，居高临下之势，而且还在于城的四郊，关隘林立，群山环抱。

邻近重庆近郊的江北、巴县等地，因地质及地势上的原因，形成了众多的关隘、峡谷，仅巴县境内，即有著名的关隘150余处，如城南的南平关、涂山、南山、黄山、文峰山等，城东南的黄桷垭、拳山垭，城东的亮风垭，城北的铁山坪、铜锣峡，城西的佛图关、二郎关、龙洞关、青木关、歌乐山、中梁山、缙云山等等，它们互为表里，互为犄角，步步设隘，层层拱卫，形成了防御重庆绝好的天然屏障。所以清乾隆《巴县志》在叙述重庆的军事地位时称：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宇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之间。

^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历代四川山水诗选注》第93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昔人以地属必争，置重镇，间为制抚军驻节，良有以也。”又有“惟渝城会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剑阁，南邛崃、牂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城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的记载^①。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在发布定重庆为陪都的命令中，对重庆也有“綰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的称誉。^②

（二）战前重庆的军事态势

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具备的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得它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历史上能够体现重庆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西晋时王浚率大军由重庆东下灭吴与南宋末年余玠率部在重庆四周对蒙古军队的防御了。历史事实表明：在中华民族多次的统一过程中，重庆及整个四川均发挥了战略基地与粮仓的重要作用，为整个中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建立以后，重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更为明显与突出，也更为各路政治势力所重视与青睐，从而成为四川乃至全国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舞台：“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是四川讨袁军的大本营，“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即设立于此并领导反袁斗争；“护国战争”时期既是北洋军队阻击护国军的前沿指挥中心，也是护国军志在必得的重要据点；“护法战争”开始后，重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政治地位一度成为“护法军政府”的活动中心，非常国会参议会议长林森、众议院院长吴景濂，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参谋长李烈钧等及国会议员70余人均曾相继抵达重庆并在此活动。

^① 转引自彭伯通著：《古城重庆》第11页。

^② 《大公报》1940年9月6日。

五四运动后，重庆又是川东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大革命时期，重庆成立了四川第一个共产党省委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并成为领导全川革命活动的指挥中枢，也是四川一系列重大活动的发源地与活动地——重庆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对北京“三·一八”惨案、万县“九·五惨案”的声援，以及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无不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中共重庆地委所属军事委员会还在重庆领导发动了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泸顺起义，给四川军阀以沉重打击。

重庆“三·三一”惨案后，虽然四川军阀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但在重庆的中共地下组织仍是“前仆后继”地斗争着，广大人民反抗暴力的斗争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潼南双江镇暴动、合川兵变、江津起义等武装反抗国民党及四川军阀统治的斗争，汇成了重庆光辉灿烂历史中的耀眼一环。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开展，重庆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吁请四川军队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重庆人民的觉醒，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奠定了思想、理论与心理基础。

当1920年10月刘湘以“川军前敌总司令”的身份进占重庆后，重庆即成为刘湘经营个人势力，以称霸四川的指挥部、活动中心与战略据点。这期间，虽然也有其他军阀部队（包括外省军阀）为染指重庆与刘湘进行多次战争并曾打败刘湘。但刘湘对重庆的“痴心”始终不改，他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手段，或联甲攻乙，或联乙攻甲，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先后打败曾占据重庆的杨森、袁祖铭等部，并将其“川康边防督办公署”、“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等由成都迁至重庆，从而建立了对重庆的牢固统治。刘湘还凭借重庆

的富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四川其他军阀，通过发动“二刘之战”，打败刘文辉，将自己的势力由重庆扩展到整个四川，进一步巩固了其“四川王”的地位。到1935年初参谋团入川前夕，重庆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刘湘手中，以至当1935年2月新的一届四川省政府成立时，刘湘一改先前省政府设于成都的惯例，将新的四川省政府设于其老巢——重庆。

参谋团入川后，国民党中央势力开始渗入重庆并以重庆为据点，向四川及西南各省大肆扩展。为了控制重庆这个军事上的重镇，扫除“军令”“政令”执行中的障碍，减轻地方势力的干扰，国民党中央频频给刘湘施加压力，要其将省政府迁成都。迫不得已，刘湘只得于1935年7月将省府由重庆迁至成都，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盘踞了十余年的重庆老巢。

四川省政府迁离重庆后，刘湘所部独立第161师许绍宗部仍留驻重庆，重庆市警察局等地方军警机关也在刘湘控制之下，因此，刘湘在重庆仍保有一定实力。到1935年8月初，刘湘在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下，不得不电令许绍宗部开出重庆城，专负维持下川东各县秩序与防务之责，使其在重庆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同年11月重庆行营成立后，负责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包括薛岳、李抱冰、万耀煌、徐源泉、周浑元、上官云相、郝梦麟、吴奇伟等军，其实力无论在人数、装备上，都远远超出刘湘川康绥靖公署的所有部队。不久，国民党中央军第16军军长李蕴珩、第36军军长周浑元率所部相继驻防重庆，其他中央各机关也纷纷在重庆设立、派驻分支机构，从而使得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人事等一切大权、均牢牢地控制在代表国民党中央的重庆行营之手。

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原参谋团对川康各军进行整编的基础上，再次于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此次会议不仅将川康各军的建制、数量大大裁减、合并，使川康各军由先前的8个军26个师171个团，整编为7个军21个师105个团，而

且将川康各军直接纳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控制之下，作为川康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只有在呈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意之后，才有权指挥调动所属部份军队。除此之外，凡有关军队的经理、卫生、人事任免、部队训练、政治教育以及其他所有有关军事的航空、防空、军需工业、兵器制造业等，均收归于国民党中央有关部会，或由委员长重庆行营代为节制与指挥，从而在军事指挥上给川康各军以极大的约束与节制，也使得国民党中央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川军国家化”的愿望得以实现，其对重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8至9月，整理甫毕的川康各军即源源不断地开赴抗日前线，直接参加对敌作战。随着川军的大批出川，国民党中央势力则纷纷涌入川内，这就为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的顺利迁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事实表明：自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办公后，尽管川局曾出现过一些波澜，但整个四川在抗战时期则始终是安全的、稳定的。

（三）参谋团进驻重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表面上获得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既不全面，也不彻底，更不巩固。名为中央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所及的只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东数省及上海、南京诸市，其它各地则大多为各个地方势力及大大小小的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刘湘、龙云等控制。为了消除此种局面，实现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打着“统一”的旗号，采用种种手段与各个地方军阀进行了近十年的混战。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并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后，蒋介石更视其为“心腹大患”，全力以赴地进行武力围剿与残酷镇压。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中央仍企图将其势力伸入动荡不安的四川。

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分别委任握有实权的四川军阀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